

如歌 如血 如火

冀中新世纪剧社回忆录

刘光人 主编



责任编辑 冀之鹰

封面设计 李 强



10.00

(文史资料 内部发行)

工本费: 26.00元

如歌 如血 如火

冀中新世纪剧社回忆录

主编：刘光人

编委：刘 纪

张文苑

傅 铎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目 录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	梁 斌 (1)
记梁斌社长	刘光人 (25)
薪尽火传忆良师	张文苑 (31)
和梁斌在一起的年月	傅 铎 (37)
回忆与梁斌同志的一次相见	邢 皓 (43)
远在千里	刘光人 (46)
千古文章未尽才	常 征 (50)
怀念郭克同志	傅 铎 (63)
忆罗品	刘敬贤 杨庆卫 (66)
在同罗品同志一起战斗的日子里	王力民 (74)
新世纪剧社在蠡县	傅 铎 (78)
我在新世纪剧社的三年	郭 濯 (91)
在新世纪锻炼成长	刘敬贤 (104)
我的童年在战火中成长	胡 健 (113)
新世纪，我成长的摇篮	邢 皓 (123)
战斗的童年	郭 华 (136)
革命让家家母亲的瓦罐里都装满了米	段 森 (142)
在华北联大学习深造	傅 铎 (147)
带文训班学员过程	刘禾光 (156)
“文训班”——我的摇篮，我的母校	相 昌 (160)
独幕话剧《夏伯阳》的演出	傅 铎 (165)
我们演出《暴风雨之夜》	李 莉 (168)

像老母鸡那样工作	傅 铎 (171)
“老母鸡”精神的传播人和受益者	薛 哲 (178)
我经历的一次反扫荡	刘禾光 (183)
在生死线上	刘光人 (188)
寻找母亲	段 森 (211)
万岁! 堡垒户	薛 哲 (222)
漫漫还乡路	刘敬贤 (228)
战友	胡 汐 (242)
突围	杨 沙 (249)
黄昏	刘光人 (257)
合法过路	沈 雁 张震 (265)
在敌人的夹缝中战斗	刘 纪 (276)
秘密接待站	郭 濯 (288)
穆苓永远活在我心中	李 莉 (297)
张彤在地下工作中	刘光人 (305)
王岗事件	刘光人 (312)
狱中狱外	刘光人 (320)
冀中新世纪剧社大事记	刘光人 (366)
在新世纪剧社工作过的同志人名录	(387)
薛坚来信	(389)
忆新世纪战友	刘 纪 (391)
怀念梁斌社长	段 森 (392)
思念梁斌	张文苑 (393)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

——回忆新世纪剧社

梁 斌

一、在蠡县

我不想把事情讲得那么离奇，然而这确实是在历史上存在的事实：抗战初期，面临着北京、天津，在河北平原上、在津浦、京汉、北宁、石德四条铁路之间，深陷敌后，建立了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最初是敌占铁路，我占乡村。曾经在这块根据地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戏剧活动。我作为参加这个运动的一员，写这一段回忆录。

1937年秋末，我因公赴豫北林县一行，1938年春天，才回到蠡县。老朋友刘通庸在县立高小给我安排了戏剧讲座，讲完了课，就介绍我到新世纪剧社。当时这个剧社还在蠡县县委领导之下，是一个自由结合的艺术团体。这年我才是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人，初生牛犊不怕虎，因为对文学和戏剧的爱好，我答应下来。在一个晴朗的日子，远处炮声响着，他领我到新世纪剧社去。剧社在蠡县城里西小街上的一座土坯小屋里。当我走进他们的办公室，见到社长张春霖同志，他是一个高个子的青年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时间不长，老同学刘纪、齐祖耀、傅铎、张震和一些小青年人跑进来，有小学教员，也有青年学生；年岁

最小的是女同志李彩云，年岁最大的是齐祖耀，也不过二十四岁，是一个年轻的剧社，他们欢迎我这个新来的人。

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郭春园同志，从1937年春天开始，我们就在一起搞地下的抗日工作，后来搞救国会。听说我要到剧社去，他来找我谈话，一边在城墙上走着，一边谈着。他的意思是说：剧社局面小，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他准备给我分配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我告诉他，自从十几岁就是一个文艺爱好者，研究过文学，后来又学了戏剧，到剧社去比较合适。由于我的坚持，他也就不勉强，工作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到剧社不久，张春霖同志到抗战学院去学习，把社长的工作让给我。我也不好推辞，因为在这个剧社中我是唯一的党员，也是唯一上过戏剧学校的人，就这样开始了工作。工作很繁重，社长兼导演，兼教员，我得费很大的力气才能使这个剧社名符其实。

在这个剧社里，从年岁大的到年岁小的，从男同志到女同志，都是爱国主义者，他们都是自动出来抗日的；自动的排戏，自动的练习唱歌，自动的写标语、画墙报。这时他们已经能演出几个戏、唱很多歌。从家里拿来了衣服被褥，骑来了自行车。用车子驮着幕布，沿村演出，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演遍了蠡县全境。往北一直演到清苑县的清凉城一带，很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这时他们已经能演：《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察东之夜》等。是一个好的文艺轻骑队。

我的工作并不是完全随心的，我得克服很多困难，齐祖耀同志帮了我很多忙，是我们的台柱子。傅铎和郭克同志演过文明戏，有舞台经验。傅铎同志生活上善诙谐不善严肃，时常把诙谐的作风带上舞台，得从思想上给以纠

正。张震同志演日本鬼子和老人是很称心的。此外，张震和王文波写一手好艺术字，能画墙画，搞舞台装置。抗战初期，女同志少，沈雁同志能男扮女装，演青年妇女，郭克同志演老太太，凑凑合合的一台戏。就是有一种困难，没有懂音乐的，无音乐指挥，只好向别的兄弟剧团学习。

我开始给他们讲戏剧概论、化装和舞台装置，教发音。满意的是他们能像学生一样听讲。有时采取上课的方式，有时一边导演一边说着。剧社成长很快。

“七七”抗战一周年之前，我在家里病着，剧社派一个小同志来叫我，说：“‘七七’到了，还没有新剧上演。”叫我回去。

演新戏，剧本没有来源，只好自己动手，写了《爸爸做错了》。内容并不复杂，事情出在廊坊。在日本鬼子到来之际，一个绅士带领众乡绅迎接“皇军”进村，并招待日军住在他自己的庄户上。夜间，日军要“花姑娘”，赶着绅士几个女儿满院小跑。后来，全村群众联合起来，打败了日军。演出效果很好，戏一开始，台下鸦雀无声，继而怒吼，继而喊打倒之声不绝。几年中这出戏在冀中区的村剧团中演出了千百场，成了保留节目。

《爸爸做错了》的演出，为我能够长期在新世纪工作下去，减少了很多困难，也改善了剧社的环境。

在这个过程里，冀中抗联会的孙犁，火线剧社的王林同志曾到蠡县，并到剧社访问。孙犁同志曾谈到“旧瓶装新酒”的问题，我考虑不多，总觉得那样很别扭，我们只用了说大鼓书、哑剧，和“跳花子鸡”，表演抗日内容。此外，无大发展。王林同志谈到“话剧地方化”的问题，使我动了深思。在此之前，除了熊佛西先生在定县平教会办剧团，演出过农民戏，在定县的东不落岗村搞露天剧场，

教农民演戏，话剧只在城市中演出。题材一般演城市戏，发音用京音国语。可是，在我的家乡，农民们不习惯说国语，偶尔有人从北京来，说几句北京话，人们就说他“撇京腔”，嗤之以鼻——不待见他。

话剧是舶来品，在表演上，有时用电影手法，农民群众看不习惯。当时，我还未看过斯塔尼拉夫斯基表现体系的书籍，自己考虑创作和演出的“现实主义”问题，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剧本，把“现实主义”的方法用于表演，深入生活，就地取材，创作一种新的表演方法，完成一种新的表演体系。当时我是这样设想的，在几年中，也是这样做过。

在发音上不完全用北京官话，就是不撇“京腔”，也不用土腔土调，创造一种新的舞台语音，叫观众爱听，反正我们也不到城市里去演出。在根据地演出，观众绝大部分是农民，战士是农民，干部少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也以农村知识分子为多，大部分是农民。我设想了这种表演体系和舞台语言，在慢慢实践着。实践证明广大农民群众是喜闻乐见的，王林同志提出“话剧地方化”的问题，为新世纪剧社帮了忙，成了农民的儿子，我们以演出农民戏著称。虽然有人说我们满脑袋高粱花子。

《爸爸做错了》的演出，使老一辈的朋友刘通庸、梁则先、李方舟等同志称赞，也博得一般同志的爱护。我们作为群众团体，参加县务会议。因此，同志们更加努力。根据地买书很难，我从家里和老朋友那里带来一部分关于戏剧方面的资料，和三十年代出的一些文艺杂志，分给同志们读。

经过舞台实践，齐祖耀、傅铎、张震、郭克、段森、李彩云等同志都是好演员，使我在导演方面省了很多力。

当时，刘光人同志才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每天读书、写日记、写墙报，显得出是聪明的，我在加意培养他们。

事情是会有变化的。抗战初期，自由恋爱在农村还不习惯，但在剧社里有几位同志就发生了恋爱关系，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还有少数同志自由散漫。我不得不表示态度。因此，引起一些责难，同志们对我有意见了。有一位演员因此不辞而别，到部队去工作了，对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出色的演员就这么几个。对此，我不得不采取措施，加紧学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干部学习制度还未建立起来，我采取了自我批评的方法。

我们从西小街搬到南大街一座花店里，是一座青砖大房子，住着也宽绰了。我们在四方大院里放上桌凳，开了第一次批评会。一部分人表现积极，一部分人表示消极，但总的效果是好的。因为批评与自我批评，虽然是初步的，毕竟是马列主义的方法。

经过批评自我批评之后，又做了个别的人事调动，剧社在思想上有了新的起色。那一位“不辞而别”的演员，又回到了剧社。

在这个时期，刘纪同志在行政事务方面，在团结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剧社的生活是艰苦的，每天两斤小米，三分钱的菜金。只好吃小米粥就咸菜，或者小米干饭熬菜汤。但是人们不以为苦，整天都是乐乐哈哈的。也有人说我们是感情团结。什么感情呢？革命的感情。在未建党的情况下，它维系着我们团结战斗。

二、在出岸村

1938年6月，路一同志带着区党委的信，来蠡县调新

世纪剧社去区党委工作。他对我谈了区党委的意图：要建立一个在党的领导下的、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的剧团。上级党来调，我无有意见，但也有所考虑：这样一个剧社，到一个新的环境里，是不是能够适应？为了剧社的调动，郭春园同志也到剧社来了一趟，他对一次调动几十个干部，也有一些意见，由于大家都还年轻、单纯，党性是强的，下决心服从调动。临行之前，刘通庸同志来送行，嘱咐了很多话。

剧社到了高阳县的出岸村，这是冀中区党委的驻地，区党委的代号是“教育股”。工、农、妇、青、回……各群众团体都住在这里，我们的直接上级是冀中抗联会——冀中各群众团体的联合组织，统一战线组织。抗联会主任史立德同志，是高个子的大学生，为人和蔼可亲，他出面接待了我们。宣传部长高铁英，也是才调来的。组织部长任志远，是我的一个老同学。

过了几天，“教育股”派人来叫我，说有事情请我去一趟，当我到了“教育股”的办公室，一个中等身材、长得很英俊的青年人站在炕上，对我笑了说：“你的党的关系来了，梁斌同志声誉很好！”我也笑了说：“没有什么好的……”他一说，我就明白，县委把我的工作情况介绍来了。

这就是区党委秘书李春兰同志，原来是定县的县委书记。他把椅子和方桌放在炕上，临着窗户办公。一边放着他的铺盖。几年中是打交道比较多的。

我们住在出岸村东郊一个祠堂里，坐北朝南。正殿做了我们的排演场和学习室，有几张方桌和几条板凳，东西厢房做了我们的男女宿舍，乡村里没有铺板，祠堂里也没有土炕，就搭草铺睡觉。但生活有所改善，此处距白洋淀

较近，鱼虾便宜，同样三分钱的菜金，可以吃到棒子面窝窝熬小鱼。有一天早晨，我们正在屋里排戏，直到小晌午才休息，走出来一看，史立德同志正盘着腿儿坐在台阶上吃我们的棒子面窝头熬小鱼。见了我们，笑了说：“好吃！好吃！”这时冀中还未分灶，上至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下至一般工作人员，都吃小米干饭熬菜汤，吃顿棒子面窝窝、小鱼，就像会餐一样美气，我们剧社人数不太多，伙食好经营，可以享受到这一点。

到出岸村，加强了学习和工作，生活比较紧张，刘纪同志从青塔书店买来了一批中国现代史，每人一本，每日清晨大家集体学习。我竟敢学大人吃瓜，给同志们讲毛主席的《辩证唯物论》。今天想起来，一个二十三岁的人，也说不清懂是不懂，人们瞪着眼睛傻听着，实在可笑。有一天，我们正在围桌学习，区党委副书记鲁贲同志忽然推门进来，我们赶紧停止了学习，站起身来，表示欢迎。鲁贲同志笑了说：“很好！很好！我们还未搞起来，你们倒早搞起来了……”说着，走到桌前，翻开书看了看，表示很高兴。

有一天，王林同志陪着一个人走进来，身材不高，穿一身竹绿色军装，白净面皮。走进院子，看了看我们的宿舍，看了看我们的排演室，翻看了一下我们的图书资料，最后看了看我们的厨房和锅灶。他不说话，我们只好陪着他走出大门。

过了两天，王林同志问我：“你知道那是谁？”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是黄敬来看你们！”我说：“哪！你为什么不做介绍？”他说：“他怕你们拘束！”

据说黄敬同志那年整整二十六岁，瘦瘦的个子，像是一个大学生。看起来对我们是很关心的。

大概是“九一八”纪念日吧！区党委召开群众大会，台下歌声朗朗，宣布大会开始。歌声停了，黄敬同志首先讲话，嗓门很高，讲得有条有理，是一个很能讲话的人。农会主任郑靠山，妇会主任赵亚萍，青会主任周克刚……都讲了话。然后，晚会开始：我们演出了《血洒卢沟桥》和《爸爸做错了》。火线剧社也演出了，也有农民上台表演少林拳术。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群众大会，部队很多，也有附近村庄的农民。

在出岸村的一段工作，博得领导和群众的满意，王林同志传达了黄敬同志的意见，说我们的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史立德也叫少先队长张树向我们学习。高铁英同志当面称赞了我们的演出，给了我们很多鼓励。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大家都在年青，血气方刚，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踏上我们的家乡，为保家卫国，不怕牺牲一切。大家爱国热情是很高的，在日以继夜的工作着。只要在那里一住下来，读书的读书，写剧本的写剧本。有人到小学校里去教救亡歌曲，有人到大街上写街头诗，写标语，画墙画，搞得热火朝天的。

区党委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支部书记叫张勃。是一个很老实的青年人。我跟他谈了一次话，他说开始在剧团建党。他不多说话，不会演戏，不会唱歌，是来做党的工作的。

秋末的一天上午，史立德同志来叫我去区党委，走到黄敬同志的屋里。就是一间老百姓的住房，一条大炕、一张方桌，一把椅子。他叫警卫员搬了一个长凳来，大家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坐在炕沿上。除史立德同志之外，还有任志远、弓彤轩、郑靠山。黄敬同志说，要组织一个工作团去十分区工作，要在苏桥一带建党，叫做“北上工作

团”。叫我也参加，并带剧社同去。他谈了文安、霸县一带的经济政治、地理、民情情况……有事实，有分析，讲得头头是道。我们都用铅笔记在小本子上。从此，我知道黄敬同志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后来才知道他做过地下党的北京市委书记。

第二天发了棉衣，发了子弹和大枪。

关于北上工作团工作，我在“两走白洋淀”中谈过了，这里不再详细谈。刚走到苏桥，五路围攻就开始了。我带着剧社仓仓促促走过了新镇、文安、雄县、霸县、安新各县，且走且演戏，枪炮声有时在后面，有时在左侧和右侧，总是不绝于耳，最后在安新演出，一面演一面装驮子，戏演完了，连夜撤退。

从北路上回来，说是敌人要来了，要大家转移。司政两部、区党委和群众团体、青塔书店……，这一搬家，大小车辆，背着、扛着的，慌慌忙忙，走到肃宁县境，又走了回来。才告诉大家，为了应付敌人冬季大扫荡，来了一次军事演习，要大家轻装这是形势动荡的开始。

三、敌人五路围攻

工作团从十分区回来，转赴七分区工作；七分区驻地是蠡县，我们又回到蠡县，仍住西小街上那座土坯小房。我到七地委听了鲁贲同志一次报告，说民军司令张荫梧闹磨擦，不断地向八路军挑衅。我们首先要把驻在七分区的民军的两个团解决掉。这两个团驻在博野县，张仲翰一个团，张子元一个团。张仲翰团已接受冀中八路军三纵队的领导。后来从深县一带，又过来了民军的一个旅，旅长王长江、政治部主任张存实同志带着。张存实同志把工作

做好，才来了一次军事行动，把队伍拉过来了。此后，张仲翰团调津南一带活动，叫“津南自卫军”。民军其余的三个团拉出来训练，后来编入警备旅。这次军事行动，对于巩固冀中区来讲，是很有意义的。这时在地方工作上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还有拆城破路，改造地形，防备敌人的进攻。

敌人五路围攻，一路从定县出发，经安国、博野、进攻蠡县，来势凶猛。七分区司令部，回避敌人的锋锐，转移了阵地，只有蠡县基干自卫队驻守。七专署通知：转移到潞龙河南的南庄村。直到黄昏时分，我们才撤出蠡县城，说敌人已经到了博野县。博野城离蠡县城很近，人心惶惶。蠡县城外有自卫队持枪防守，回头一看，在薄暮中，蠡县城的上空，起了无数蓝色的彩火，是敌人的讯号弹。说明敌人到来之前，汉奸特务已先到了。日本法西斯军队的进攻，不容低估。

夜半来到南庄村，社部找了一个小房子住下。冬季来临，小房子很冷、很潮湿，找了一些玉米秸铺在地上，睡了一大觉，这天晚上没有吃饭。自此开始了游击生活。

县各机关转移到城东王家营村。我们在这里开始了战时工作，写墙报、标语，演街头戏。有一次在村北的庙台上演戏，观众还是不少，演的是远千里同志写的活报剧。县救亡室也开始活动，晚上点上汽灯，在大街上演讲，动员群众起来坚壁清野。蠡县城已经失守。县各机关团体组织工作团，赴前方工作，我们也参加了。

这天早晨，阴历腊八，大约1939年1月份的一天，听得正西方向有隆隆的声音，也不知是炮车还是坦克。由于改造了地形，直到下午，县里通知说敌人来了。我们急忙撤出王家营。农民群众扶老携幼，牵着牛的，背着包袱的，

顺着交通壕往东跑。当我们出村时，看见游击小组在村边上挖了战壕，手持手榴弹，看着我们说：“你们走吧！我们给群众掩护一下！”我们不是战斗部队，也实在无有办法。

我们向东走去，听得西方很近的地方，响起了像刮风一样的机枪声，夹杂着空中炸的炮声。后来，才知道驻在大王村的九分区一个机枪连和敌人打了遭遇战，打死了许多鬼子，我们的战士遭受到很大牺牲，村子也让敌人烧了。一直过了瀦龙河，夕阳西下时分，敌人到了瀦龙河的大堤上，透过夕阳的光芒，看得见敌人在大堤上的活动。敌人的飞机在空中盘旋，飞得很低很低，是给日军送东西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敌人。

这天夜里我们继续向南走着，沿途各村明火执仗的在村公所支上大锅为撤退到河南的干部和战士烧火做饭，有烙饼的，有煮麦条的，真是一片万众齐心抗日的景象。这天夜里，我们一面走，一面琢磨着这个游击怎么打法。既然，敌人大队人马向东来了，我们就应当向西迂回，向它的后面去。于是，我们一夜走了几十里地，到城南接近肃宁县境的一个村庄。恰巧，县政府也撤退到这里。为了研究在这样形势下怎样工作，准备到区党委去请示。回去之前，在一个夜里，我回到家乡看望，顺便拿些东西和钱用。走着，遇上九分区的部队，四路纵队开赴前线，说是要收复蠡县城。

蠡县城已经拆除，敌人占领之后，抓了很多民伕，打上土墙，钉上铁丝网。第二天夜里，前方打响了，双方枪炮之声，不绝于耳。我的村庄离城十八里，人们都站在村西瞭望，听得八路军的喊杀声震动天地。城附近的群众也喊杀助威。由近及远，我村附近各村的群众也喊起来。几